

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红色往事

□作者:钱玉亮

记呢?容风貌,又镌刻着怎样的时代印
三年,那究竟是一段怎样的“市”
越尘封的历史时光,回溯一九四
在报纸泛黄的字里行间,穿
根据地内,均已能自给自足……
烟业方面……酱业方面……现在
天长县属之铜城市一地而言,纺
业作坊林立于各市镇村庄,单以
日上,民生安定,商业繁荣。手工
以来,日益巩固,各种建设,蒸蒸
路东根据地,自一九一九年春建立
《新华社华中廿一日电》淮南讯,
战地通讯中,有这样一段记述:
《解放日报》当年刊发的淮南
年有余。
撤,铜城市至此结束,前后存在不
及铜城市的党政机关人员奉命北
挑起全面内战并占领铜城,天长
一九四六年七月,国民党军
区级“铜城市”。
行政公署将天长县铜城镇升格为
发展与抗日斗争,淮南苏皖边区
该区域的管理和建设,推动经济
一九四二年二月,为加强对
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之一。
地,也是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
地和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驻
时期,这里是天长县抗日民主政
长、高邮、盱眙交界处,抗日战争
铜城位于皖苏两省三县天
然而,没错。
成了“市”。
纸错了一个字,把“镇”或“区”印
《天长铜城市》字样时,初以为报
这张泛黄的报纸,看到标题中
八十多年后的今天,当看到
油各业发达》。
蒸蒸日上——天长铜城市纺织榨
讯:《津浦路东根据地经济建设
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刊登了一则通
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,



►天长市铜城镇龙岗抗八分校纪念馆

一

铜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,居于苏皖边界,津浦路东,高邮湖西,铜龙河夹镇而过。彼时有“上五镇”与“下五镇”之说:“上五镇”包括黎城镇、铜城镇、东阳镇、马坝镇、永丰镇;“下五镇”包括金沟集、塔儿集、闵家桥集、银集和涂沟集。而铜城位于“上”“下”之间,这里水陆交通便捷,可上通下达。

1937年,七七事变爆发,侵华日军长驱直入。同年12月,南京失守,次日扬州沦陷,镇内一时兵荒马乱,各业均遭不同程度骚扰与劫掠。

1940年4月中旬,中共天长县委、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镇正式成立,周利人为县委书记,陈舜仪为县长,党组织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。

1940年9月,日伪军万余人向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侵犯,根据地军民奋起还击。

1941年5月,日伪军再度组织5000余人,对石梁、梁涧、张公铺、铜城发起疯狂“扫荡”,张公铺被焚烧一空,铜城被炸毁民房200余间,中共天长县委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转移途中也遭受一定损失。铜城作为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要镇,就是在这样时局动荡的背景下,军民一心,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摩擦”、反“蚕食”,艰苦卓绝,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,迅速开创了“各种建设,蒸蒸日上,民生安定,商业繁荣”的局面。

二

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,新四军二师

在罗炳辉师长率领下也进驻铜城一带。

作为坚强后盾,抗日民主政府很快站稳脚跟,开始发动干部、组织群众,大力宣传抗日主张与巩固根据地的战略意义,关心民众疾苦,稳定人心。

同时,为积极恢复生产,推动根据地经济复苏,采取了一系列保障举措,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政策。如,实行减租减息,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;开展大生产运动,鼓励垦荒屯田;大力发展工商业,减免部分工商税收;推动普及教育,开办“扫盲班”和抗日夜校,培养抗日干部人才,等等。在根据地的建设发展过程中,罗炳辉师长“铜城设宴”的故事,可谓家喻户晓。

为支持天长抗日民主政府尽快恢复经济、发展生产,罗炳辉师长进驻铜城后,很快派人请来商会会长,与其谈心交流,希望他能以民族大义为重。

随后,罗炳辉拟定了各大商户及当地有名望的士绅名单,写下朱红请柬,派通讯员逐一送达,邀请他们前来赴宴。

席间,罗炳辉开门见山地说:“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,是抗日民主的队伍,请诸位不要听信顽固派的谣言。抗日救国,匹夫有责,在这民族存亡之际,我党我军的一贯政策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,一致抗日。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实行‘三三制’,欢迎诸位参与我们的工作!”

罗炳辉的一番话开诚布公,说得各位士绅、商人频频点头,疑虑全消。不久,不少开明士绅、商人参与到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中,对铜城及全县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从1940年到1943年,短短的几年时间,在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,在新四军二师和罗炳辉师长的保驾护航下,铜城经济民生逐

渐恢复,并发展成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座重镇。

在经济上,成为津浦路东地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、商业中心和对(其他敌后根据地和敌占区)贸易枢纽;在政治和文化上,成为整个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;在军事上,成为军需物资筹集、储存、调运重地和兵源补充及训练基地,从而为根据地的存续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三

1943年2月,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,路东地区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和路西联防办事处撤销,成立新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,下辖津浦路东、津浦路西两个专员公署,方毅任行署主任,汪道涵任路东专署专员,郑抱真任路西专署专员。

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,巩固壮大根据地,同年5月,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决定,在一些较繁荣的区域经济中心,建立3个由所在县领导的小型城市。

同期设市的有:天长县的“铜城市”、六合县的“竹镇市”、津浦路西定远县的“藕塘市”。铜城市(区级)下设三镇、三乡,即:普济镇、山海镇、铜西镇;埠南乡、铜南乡、齐庙乡。

铜城市的设立,进一步加速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复苏。铜城设市前,全镇除了一些私人手工作坊,没有工业,缺少原材料,一些物资遭敌占区封锁,来源非常困难。

铜城市成立后,在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的帮助下成立了利华贸易公司,并下设若干分公司与门市部,通过多种渠道,采取各种方式,努力活跃市场,积极鼓励商人利用各自的门

路,购进根据地需要的物资,输出根据地需要外出的商品。同时着力打击囤积居奇、操纵物价的投机不法分子。

除了集市上的货物得到供应外,一些作坊、工厂,如棉织社、摇丝坊、糖坊、酱菜厂、肥皂厂等,也纷纷上马生产。

据《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》记述,当时“铜城镇商店林立,私商铺多达100余家,招徕了他乡四方的行商客贩,流动人口每天在1000人以上。”

1942年春,在张云逸副军长的支持下,由二师供给部入股的新群烟草公司在铜城诞生。这之前,镇上有一家由几户商人合办的卷烟厂,因国民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,已濒临倒闭,二师供给部的介入,使这家卷烟厂顿时起死回生。

其后生产的“飞马牌”香烟,不仅受到根据地军民喜爱,还通过地下渠道销到了国统区和敌占区,换回了食盐、西药、五金等重要物资。

以“市”为核心,下属镇、乡各种手工业作坊也方兴未艾,加之军民联合开展的“大生产运动”正如火如荼,铜城市在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,一时被人们誉为“小上海”。

四

铜城市“经济建设蒸蒸日上”的景象,吸引了新华社华中分社记者的目光。

1942年底,著名记者范长江带领仅有7名报务员的华中分社,随新四军军部进驻盱眙县黄花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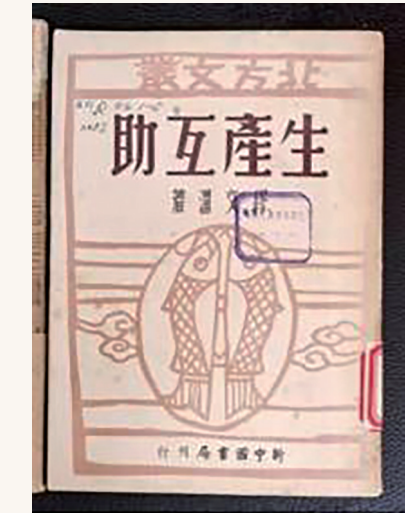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里,他们一行亲眼见证了新四军与人



▲生产“飞马牌”香烟的烟厂旧址



▲1943年6月22日的《解放日报》



▲《生产互助》缪文渭著

民群众鱼水情深的动人场景,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繁荣面貌,以及根据地新文艺运动的蓬勃生机。这些见闻通过电讯不断发往延安,相关报道也频频登上《解放日报》的显要位置。

《解放日报》1941年5月创刊于延安,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。

1943年6月21日,一份电稿以“新华社华中”的名义飞向了延安,这就是刊登在22日《解放日报》头版的《津浦路东根据地经济建设蒸蒸日上——天长铜城市纺织榨油各业发达》。

通讯语言简洁直白,风格朴素,通过具体行业和翔实数据,生动展现了津浦路东根据地铜城市的工商业发展面貌。

文中既体现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的自主与活力,也蕴含着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,极具鼓舞人心的力量。这篇通讯,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珍贵的纪实价值。

在铜城市经济日渐兴盛之际,新四军二师还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“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”的号召,组织军民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

二师全体干部战士,一边坚持军事训练、学习文化,一边帮助群众进行生产劳动。他们开荒种粮、植树种菜、养猪养羊,实现了全年蔬菜、食油自给,不仅改善了自身生活,还提高了部队战斗力。

次年10月,根据地党政军在铜城市联合召开群英大会。白天,举行民兵大比武检阅活动;晚上,大众剧团和淮南各地方剧团进行汇报演出,此次演出号称“百团大会演”。

当时,整个铜城市内,戏台林立,人头攒动,街道广场灯火通明,热闹非凡。应罗炳辉师长之邀,范长江也来到铜城参加了大会。

在观看演出时,天高民兵大众剧团演出的地方戏曲《生产互助》,引起了他的关注,当得知剧本是一个叫缪文渭的农民创作的,他非常高兴。

他高度肯定这是一个好剧本,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意见。缪文渭在他的指点下,进一步结合大生产运动,对剧本进行了认真修改。

不久后,范长江还专门撰写了《〈生产互助〉及其作者缪文渭》一文,对该剧和作者进行了介绍,缪文渭和《生产互助》也因此在地根据地一举成名。

后来,成为作家、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的缪文渭,每每提及此事,总是动情地说:“我能有今天的成绩,完全得益于我的益友良师范长江同志,完全得益于当年津浦路东根据地军民互助的抗战热情。”

一张泛黄的报纸,一则简约的通讯,既承载着天长“铜城市”的烽火记忆,也定格下根据地军民共克时艰的壮阔图景。

如今,铜城的街巷早已换了新颜,发展的脚步远超当年的憧憬,但那段历史淬炼出的精神遗产,却在岁月流转中愈发璀璨。

这个时节,天长市永丰镇二墩村被浓浓的绿意包裹着,暖风里透着草木疯长的气息。我们几位志愿者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整理档案,翻出了几张老照片。当那张熟悉的笑脸再次映入眼帘,大家才恍然觉得,他从未走远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继续守护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

照片上,一位身着红马甲、头戴鸭舌帽的老人,皮肤黝黑,个头不高,坐在长条凳上,身子微微前倾,笑得那样灿烂,仿佛要把这世间所有的道理都揉进这温暖的笑容里。

“这是吴维勤老书记,去年冬天刚走。”现任村支部书记邵士海的声音低了下去,目光在照片上久久停留,“村里人到现在,遇到难解的结,还会念叨他。”

吴维勤,二墩村老党员、老书记,1971年入党,当了20多年村支书。2025年冬天去世,享年78岁。他有一句带着泥土芬芳的口头禅,村里老少都会学着说:“做人做事,腿弯子要伸得直。”

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,是在田埂上、在堂屋里、在吵红脸的两人中间说的。在吴维勤看来,道理很简单——你自己先站直了,别人才肯坐下来谈,心气才顺。

邵士海又翻出两张照片。一张拍的是二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“学习身边模范 推进乡风文明”主题宣讲会,老书记站在横幅下方,胸前挂着“十佳乡贤”红绶带,面前是一排排小板凳,坐满仰着头的村民。另一张是在村口石凳子旁,他手里举着一本移风易俗宣传册,正跟大伙讲着,乡亲们认真地听着。照片里的他,总是笑眯眯的,坐得直,站得也直。

“做人做事,腿弯子要伸得直” ——追记一位村里人都会念叨的老党员

□作者:李昕怡

2011年,从村支书岗位上退下来,吴维勤不像别的老人那样每天打牌遛弯,而是翻法律书,对着电视里的调解节目琢磨话术,记在本子上反复推敲。乡里乡亲的说个事评个理,还习惯性地找到他。他不随便开口,一开口便是有理有据。乡亲们信他,信的不是他的嗓门,不是他的老子,而是他嘴里那个“直”字,是他肚子里装着的理。

2022年秋天,村里高标准农田改造。三个村民组地界不清、标准不一,为犄角旮旯的权属问题吵了大半个月,施工队进不了场。吴维勤还挂着网格员的名,他没有退缩,白天夹一把卷尺去田头,一步一步量;晚上揣一包烟去村民家,一家一家敲。

有户人家比较难缠,他连着跑了七趟。天黑进门,深夜出门,坐在堂屋里,反反复复摆事实讲道理:“你让一寸,他让一尺,路就宽了。腿弯子伸得直,事就好办。”

第七天晚上,从那户人家出来,走到村口老榆树底下,

他靠着树干坐下去。一起去的人伸手要扶,他摆手说,歇一会儿。不到一分钟,人就不动了,然后人被送进医院。

邵士海赶到医院时,吴维勤已醒了,鼻子里插着管子,看见人就问:“事情谈妥了?”邵士海说差不多了,他闭着眼,点了两下头。出院后没多久,他又回了村里。远远地有人喊了一声“老书记”,他笑着应一声,头也不回,径直往田里走去。

纠纷化解后,那户人家提着东西上门致谢,情意满满地非要拉他喝酒。吴维勤把他让进堂屋,倒了两杯茶,自己先端起来:“酒不喝了,茶可以喝一杯。”两个人坐在方桌两边,喝茶,聊家常,仿佛之前的剑拔弩张从未发生。这,就是吴维勤的“直”——对事不对人,心底无私天地宽。

他被推举为村红白理事会会长,家也成了全村不挂牌的“说理处”。夫妻吵架推门就进,邻里闹别扭坐下就说,谁家办红白事铺张了,他也上门劝。有人问他天天管这些

事,累不累,他嘿嘿一笑:“看到快散的小夫妻和好了,看到矛盾和解了,比什么都高兴呢。”

他还有个“怪脾气”:有困难,往前站;评荣誉,往后退。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年轻人多露露脸,以后好办事。”前几年,评了个“十佳乡贤”,还是村里硬塞的。那条红绶带,他在宣讲会上挂了一回,回去就叠好,放在抽屉里,再没拿出来过。在他心里,群众的口碑,比什么奖状都重,他最在意的,还是村里人随口喊的那句“老书记”。

去年冬天,吴维勤走了。出殡那天,天特别冷,老老少少站满村口那条水泥路,看着灵车慢慢开远,没人说话,也没人先走。邵士海站在最前面,回头看了一眼,后面站满了人。

如今,二墩村再有人闹矛盾,吵着吵着,冷不防会冒出一句:“要是老书记在,他会咋说?”这句话一出来,两边就安静了。大家心里清楚——那个笑眯眯的、腰杆挺直的老头子,已经把他该讲的道理都讲完了。

一名老党员,就是一面旗帜。吴维勤用一辈子挺直的“腿弯子”,给村里人留下了最朴素的念想。在基层治理的宏大叙事中,他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注脚,但他用那份正直与热忱,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写下了最生动的篇章。他告诉我们,只要腰杆挺直了,腿弯子伸直了,脚下的路,自然也就宽了。

